

厦门大学80周年校庆重点学术活动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联合组织

中国城市化：

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

An 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陈甬军 陈爱民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中国城市化：

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

An 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陈甬军 陈爱民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陈甬军,陈爱民编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6
ISBN 7-5615-1897-8

I. 中… II. ①陈…②陈… III. 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F29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6626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市新嘉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3.5 插页:2

字数:773千字 印数:2 000册

定价:5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言

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

■ 德怀特·H·帕金斯*

(一)

更好地理解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的动力有助于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它能够为制定中国经济政策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其次,它有助于外部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面临的挑战;同时,它促进了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包含在旨在更全面地领会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对今天的听众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你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不感兴趣,你们也就不会出席今天的会议。

认识到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是一回事,但是设计一个能够真正指导或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有效的研究项目是另一回事。如果你首先不了解在高收入的后工业化国家中推动这些研究项目的作用力,就不会知道这类作用力在这些国家中是如何决定培养经济学家的方式的,你就很难提出一个有效的研究项目。

美国及其他有相似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研究议程,部分是由对基础理论做出贡献的愿望所驱使的,部分则受到当时这些国家中主要政策问题的感召。这一点没什么新奇。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时,当时主要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更多的是关注经济增长和发展。但是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兴趣在19世纪末新的研究计划中已不再出现,直到二战后,马歇尔计划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才再次将增长问题提到研究领域的中心。但是这个

* Dwight H. Perkins,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前所长,著名经济学家。

时间不长,经济学研究领域又重新回到对微观效率、收入分配差距和宏观稳定等问题的关注上来。在过去的 20 年中,对增长问题予以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如何构建将技术视为内生动力因的增长模型上面。这个问题主要是对于高收入国家中尖端科技的研究兴趣。这其中有些例外。显著的是,计量经济学和国民收入核算工作试图识别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很难将其视为对政策制定实际有效的指导。实际上,许多试图从此类工作中得出政策性结论的努力,例如对资本形成和地理的重新强调,很可能与我们的主旨毫不相干。

美国及其他高收入国家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研究议程对这些国家的教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如果对其局限性没有认识,那么西方教育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在美国和欧洲出现的教育的局限性在中国同样存在,只是两个不同地区所受的局限不同而已。中国最好的大学正在迅速提高他们对研究生的现代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尽管这些现代的经济学课程受到西方教学领域的极大影响,但因为这些大学在中国,所以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将最大的关注投向中国的人民和政策制定者。就像在美国,最好的应用工作通常是由熟悉美国主要政策问题,并谙熟其社会制度的人来完成的一样,中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被中国的主要政策问题所吸引并沉迷于这些政策发挥作用的制度框架中。随着中国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允许对现行政策提出有力的批评,中国对经济问题研究的质量也会随之提高。因此,我的评述不仅指向中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指向或者来自中国,或者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并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

(二)

对于那些在国外接受教育并对中国经济抱有兴趣的经济学家,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不同的。在此我主要是指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因为这是我最了解的。对他们而言,挑战主要来自于如何将所掌握的良好理论及计量经济学技巧转化成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真正有用的东西。我怀疑你们中的多数人,就像哈佛大学我的许多同事一样,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你们受到了极好的教育并准备向世界特别是中国展示你们的能力。

我所指的大概可以由将近 30 年前我在汉城韩国发展研究所(KDI)的工作经验来说明。这个研究所是在我去之前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建成的,并且想方设法从美国和德国引入了 12 位优秀的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也因此将当时韩国拥有的博士学位经济学家的人数增加了 3 倍。这 12 位经济学家忙于开展研究和撰写论文,但他们的大部分研究或者派生于他们在国外的研究,或者受到当时美国国内对美国开展的相关研究的启发。当时 KDI 的领导(后来成为韩国最有名的副总统之一)发现,他们的多数研究对于理解韩国的经济几乎没有帮助。实际上,他邀请我和我的两位更为资深的同事在当年夏天去韩国的原因,就是帮助韩国年轻的经济学家将他们的研究重心转到对国内经济更为有用的方面来。KDI 的领导需要的不是诊断韩国病症在哪里的帮助,而是他感到他的年轻下属应该更擅于真正聆听哈佛教授认为值得提出的问题。

当时的问题从现在看来在某些方面更严重。美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特别重视经济学

理论以及高超的计量经济学技能,同时用“新增长经济学”对许多国家进行实证性比较工作也受到重视。但是对应用领域的关注多数倾注在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上。像我已经提到的,致力于美国经济研究的研究生和年轻的教员,通常被认为对影响经济的社会制度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通常,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的经济学研究生和年轻的教员却对影响他们所研究的经济的社会制度知之甚少。而且,一旦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获取这些知识,他们又面临着被称为“地区专家”的危险。

因此,许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就是先寻找数据,然后通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技能,观察这些数据存在何种具有统计重要性的关联。或者,发展中国家经济可以为某些有创新的金融危机或宏观非均衡模型提供有益的启示。这里强调的核心是模型的创新性,而非对危机或非均衡广泛基础的理解。如果这些工作做得好,的确能够对更好的模型做出贡献,同时也会增加我们对全球变量之间关系的了解,比如教育和工人的生产效率。但是我们并没有学到很多在我们所研究的经济中占支配性地位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中国经济及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在哪些方面适应这种情况呢?中国,尤其是在过去的20年里,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结构性转变,而且这种转变在高收入的后工业化国家中不会再次发生。这些结构性变化对中国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我并不清楚这个进程到哪里会终止。美国有几百位经济学家非常老练地分析如何使业已高效的资本市场更为有效,而在中国,只有少数的经济学家奋力研究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中国需要怎样的金融机构,怎样创立这些金融机构并使之良好运作。中国可以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的优点与不足得到启发,但中国绝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模式。

研究中国经济之所以令人振奋是因为我们是在对付真正的重大问题。将来总有一天中国会有成千上万的优秀的经济学家。他们每人都着眼于或者这个或者那个小的问题,例如边际税率百分比的变动对储蓄和税收形成的影响,或者是对汽车轮胎需求衰退的影响。但是现在,经济学家需要特别关注结构转变这样真正重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一点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都是令人振奋的,但是中国更甚。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比其他国家大得多,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决定着整个世界的变化。同时,中国在短期内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更多重大的变化。不仅仅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相当高,而且因为中国将高增长率与对其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结合在一起。

(三)

这些重大问题到底是什么?经济学家应该怎样研究它们?就此我会先讲几点,然后回到为什么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他想对理解这些问题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需要调整他的研究视野这个问题上来。

1. 城市化是所有最有趣的结构转变问题之一,也是这次会议的主题。1979年以前的中国以及此后中国的某些方面,将在其他许多国家中发现的城市化模型予以改造变形。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衰退的户口体制效率很快就削弱了政府决定城市化模式的能力,但是政府的这种能力没有完全消失。人均收入增长既是城市化增长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但是

中国如何影响其从公路到住房到电力的基础投资,大概仍将决定人们以何种速度移入城市,移入哪座城市,以及他们进入城市后的生活状况。

住房政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选择是忽略这个问题并按照马尼拉或 20 世纪 50 年代圣保罗或香港的模型,允许大片的简陋的住宅区包围最繁华的城市。相反的做法是仿效 20 世纪 50 年代后的新加坡和香港,建造大量的公共住房。中国能承担得了这么多的住房建设吗?有吸引力的公寓,会使更多人迁到城市。如果城市的生活过于吸引人,结果可能是将大比例的失业及未充分就业人口从农村转移到类似美国称为“高级贫民区”^①的地区。与新加坡和香港不同,中国大陆在其城市周围没有围墙或国际边界来限制移民进入。

正如这次会议证明的一样,随着城市人口或至少是非农业人口逐步超过农业人口,中国面临着许多重大重要的问题需要应对。美国城市经济学是在人口移入城市后才产生的。中国在城市化开始时就试图理解并影响这个过程,既有优势同时也面临着挑战。也许没有很多的选择,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国不得不重复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模式。但由于对增长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只完成了少量的比较性工作,因而我们并不真正清楚中国是否会重复这些模式。

2. 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地区发展是如何进行的。中国内地和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当今中国政策系统的主题。过去中国地区发展政策是由开发内地资源的愿望或军事方面的原因而驱使的(如 60 年代的“三线”产业)。地方分权同时常常将促进什么及怎样开展的问题留给地方政府来决定。

对于地区经济在中国大陆这样规模的市场经济下如何产生,我们的国际经验是有限的。欧盟近来才取消了其国家间内部移民的壁垒,因而对大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形成指导经验。前苏联斯大林关于区域发展方法的重大曲解今天也显而易见地不会再被重复。于是美国或巴西的经验就成了对会发生什么及应该发生什么的积极或消极的指导。20 世纪前半叶,特别是在二战中,美国北部和西部存在大量的劳动力移民,而 20 世纪后半叶南方出现了大量的工厂(鞋厂、纺织厂和机器设备)和资本移动。中国目前的状况看来是劳动力和资本统统流向沿海地区。这种移民模式并不反映出有效的市场力量,而只是存在这种模式的原因所在。由于沿海地区的工资较内地高,劳动力移向沿海地区是合理的,但资本应该向工资较低的地区流动。是因为内地缺乏物质基础设施而阻止了资本的流入?还是缺乏金融基础设施?或者是由于内地政府依旧像计划者、管理者及租金寻找者一样思考问题,并赶走了想利用内地比较优势的风险资本家?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而且尽管已经有人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至今也没有见到其他学者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无论经济学家研究这个问题与否,区域发展终究要发生。但是我天真地认为,如果我们对影响这个发展的动力机制有更好的领会,它带给中国的好处将是巨大的。而且一旦我们理解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了解到更多的区域发展的本质。

3. 我最后一个例子来自经济学中一个相当不同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对我,对很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它也是一个国际性比较工作较为薄

^① 美国从未真正有过“高级贫民区”,但是一些城市经济学家担心在美国城市中过分升级贫民区将导致大量的不适于在这些城市中工作的人口流动。

弱,其提供的指导也有限的领域。我所指的这个领域就是产业组织和公司财务。

描述这个问题相当容易,但要指出解决它的办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问题始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继承的产业组织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产物。在中央计划经济下,企业不过是庞大的计划官僚机构的低层。1984年以后开放的市场使得小型地方企业(乡镇企业)的繁荣填补了许多计划体系的不足。然后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对产业组织产生重大的影响。除了外商直接投资,这个继承的组织体系与中国当前发展水平和市场定位所要求的产业组织结构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中国究竟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产业组织?迄今,多数的争论还是停留在究竟是日本的 keiretsu 模式还是韩国的 chaebol 模式才是中国应该采取的产业组织模式上面,尽管日本近年来的麻烦和韩国卷入亚洲金融危机使许多提倡这类模式的主张陷入停顿。虽然中国还没有明确应该朝哪里发展,然而,随着成千的企业集团的组建和重组,兼并和收购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

但是在中国这样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组织结构应该怎样呢?现存的产业组织领域并没有给我们很多指导,也没有人能够自信地认为,如果政府不再干预,那么兼并收购赖以形成的制度和法律框架将会让市场力量来产生有效的结果。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指导这个过程的法律不适当。制定新的法律很容易,但是创立一个独立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的司法体系又是另一回事。政府在这个领域及其他很多领域必须介入,因为薄弱的司法机构不能为公司对市场力量独立做出决定提供足够的法律框架。

在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公司理财方面。西方目前有关于如何制定破产法以保证有效产出的重要文献。但是这类文献绝大多数假设法律是严格按照制定的内容来执行的。但从中国和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或过渡经济的事实来看,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少数股东的权利问题是另一个方面。在先进的后工业化国家中这个问题有严谨的法律程序,可是在中国,无论法律如何解释,中国及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少数股东几乎是没有权利的。这种状况在有些国家,比如韩国,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股东甚至没有雇用和解雇管理人员的权力。

无论如何,中国政府会找到解决这些产业组织和公司财务问题的办法。然而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几乎没有给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其他可能选择的分析。律师们也没有做得更好。少数律师在法制体系薄弱的情况下还试图钻法律的空子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问题是巨大的,并要求绝非只是少数法律学者的关注。

(四)

上述这些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的主要结构性问题很容易就被扩大。毫无疑问,听众中的多数有你们自己最感兴趣的课题。经济学家应该怎样着手从事这些或其他的问题研究?我的回答是非常简单的:

1. 你首先必须愿意去咨询并研究这些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出发点应是那些真正影响中国今后发展的问题,而非现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学界恰好关注的问题。
2. 第二步是对制度、法律以及决定结构性转变的其他因素有一个全面和充分的了解。
3. 与第二步密切相关的是理解可利用数据的性质并尝试回答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

还没有数据,要想出怎样着手才能得到需要的数据,而不只是利用现有的数据作回归分析。

4. 不能只关注中国发生的变化。应该建立一个比较框架,并且相关的比较通常应建立在那些你已经做了基础性工作的国家之间。因为很可能我们要进行比较的内容还不存在。

5. 如果以上几点都做到了,你所拥有的高超技术将帮助你获得可靠的答案,因为它们是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

这些步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如果你不只想利用现有数据作回归分析的话,对跨国数据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尤其困难。深入研究和掌握不同国家制度或体制的工作是几十年甚至终身的努力。我所提出的研究策略能让你在美国大学中获得一份工作或取得任期吗?也许它无法让你很快地在西方研究机构中得到高薪。但是如果你好好地去做,我希望它会使你们中的某一位或几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无论它是否能带给你任期或荣誉,如果你有效地研究了这些问题,你将对中国和其他与类似问题做斗争的发展中国家做出重要的贡献。

前言

城市化是我国新世纪发展进程中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为交流国际经验,研究中国特点,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及具体对策,反映海内外学者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决策咨询意见,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厦门市政协和厦门大学联合主办的“城市化: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挑战与对策”国际研讨会于200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本书就是根据此次研讨会的论文精心选编而成的中国城市化专题研究性著作。

一、研究的缘起

城市化在经济学中的基本含义是指由于工业化而引起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城市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虽然城市化(urbanization)的概念由西班牙工程师 A. Serda 在 1867 年才提出,但从世界经济的历史来看,城市化进程在此前的工业革命开始时就已启动。由于它强调的是动态发展和扩展的过程,所以中译时就根据它的字根的基本意思而译成城市化。

对城市化的研究,已有众多学科的学术积累。经济学上通常是结合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演进等方面来研究城市化问题的。一般认为,城市是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与分化过程。从城市化的生成机制和发展演变的过程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密切相关性,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 and 经济结构程度。工业化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带来了产业结构的演变,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高度化。

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标志是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大超过第一产业的比重。由于二、三产业的共同特点表现为它们都需要人口的集中,以形成劳动力人口的积聚和消费市场的发展,因此人口向城市集聚就有一个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作为动力。由此,城市化过程就应运而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产业结构和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又会对工业化的集约发展和产业结构演进发挥促进作用。因此,城市化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与城市的具体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的研究在研究角度和层次上有所不同(虽然它们又密切相关),^①它是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层面来研究城市化的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和发展对策。由于经济学对城市化的研究主要是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特别是从工业化发展而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从而导致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这一线索而深入展开的,所以城市化问题一般归属于发展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若不能说汗牛充栋,也可以说是目不暇接。

老问题为什么要作新研究?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太多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与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相比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其中既有中国特色的创造和发展,又有当时探索过程中的“盲点”和失误。一个最直观的表现是,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看,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现在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已多年接近或达到50%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已达到较高程度,而城市化水平与其却不适应。即使按照宽口径,采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把在城市居住一定期限的流动人口统计在内的统计方法,2000年我国按城市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也仅为36.09%。中国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呈现较大的反差,也表现出与世界城市化进程一般规律相背的现象。这一现象需要有一个理论解释。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城市化问题的解决密切联系。如,目前亟待解决的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就与城市化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一问题上大家的基本共识是,要使农民富裕,必须先减少农民数量。彻底打破城乡壁垒,使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又如,加入WTO后增强我国农业的竞争力,也离不开城市化的推动。因为,要使我国农业能够对付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挑战,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的有机构成,减少活劳动投入,增加科技含量。这既要求有大量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又要求用二、三产业的收入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再如,我们每个人每年都会遇到的“春运”问题也与城市化息息相关。据统计,我国农村过剩劳动力已达1.5亿人,每年有8000万人离乡外出打工,其中有一半跨省流动。由于城市化步伐缓慢,大量进城工作的农民无法被接纳到城市体系之内,只好每年在春运中像“候鸟”一样定期定向流动。他们成为在城乡之间摆动的边缘人群,在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专设了“实

^① 实际上现在许多人还仅是在后者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城市化”一词的。如在中国工程院组织评选的“20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中,也将“城市化”作为评选出来的25项重大工程技术成就中的第23项(见《工程技术百年颂》,《光明日报》2002年2月8日《科技周刊》)。更有一些基层领导把“城市化”简单地理解为修路盖房,搞了许多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因此,我们认为,强调城市化的经济学意义,认识城市化的发展机制,对搞好城市化有更为基础性的意义。

施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共同进步”一章,^①提出要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同时要消除城镇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国家“十五”规划下设有10个专项规划,其中第一个就是城镇化问题。这表明城市化问题在世纪之交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重大问题,亟待在理论上研究,在实践中推进。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是以中国大陆留学北美的经济学者为主体成员的学术团体。从90年代初期开始,它每年都要与国内学术单位合作,组织一次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以此形式组织在世界各地的会员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正因为有这样的联系机制,近年来,身居海外的中国经济学者也敏锐地感触到了中国城市化研究这一理论研究需求的“脉动”。2000年夏季,我们在美国反复讨论,商定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1年研讨会的主题定为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并提议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厦门大学联合主办这次研讨会。当年10月,厦门大学领导很快同意了这一提议,并高度重视,将其列入厦大80周年校庆的重大学术活动之一,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厦门大学和厦门市政协联合主办。由此正式揭开了此次研究活动的序幕。

2000年年底,会议征文公告在《经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经济学消息报》和CES网站上同时发布后,得到了海内外众多经济学者的热烈响应,3个月内收到应征论文300多篇。经过会议学术委员会的遴选,有90篇论文入选研讨会,并编印成册。2001年6月下旬,研讨会在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厦门顺利召开。群贤毕至、老少同堂。从白发苍苍的著名经济学家到初出茅庐的博士研究生,从大洋彼岸飞来的海外学者,到长期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本土专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国内外经济学者百余人,通过主题报告、分组讨论和圆桌会议,对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结构、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农民与居民的关系、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与农村城镇化的模式、城市化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政府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及城市医疗保健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大家热烈讨论、互相切磋,为正在寻找“理论营养”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内容丰富、针对性很强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相关人士和媒体认为,此次研讨会是1999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在“十五”期间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以来,有关中国城市化问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有的观点通过媒体披露,当时就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的反响。

为了增加感性认识,掌握第一手资料,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还组织部分会员于会议前后在闽南厦、漳、泉三市和闽北南平市的部分县市,进行了福建城市化问题专题考察和调研活动,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为普及现代经济学知识而在厦门大学举行的系列讲座也受到了广泛欢迎。

为了使会议成果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尽快编辑出版一本专题性的研究著作。我们以对中国城市化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和对策研究为主要选择标准,从入选研讨会的论文中再次精选了60篇论文,按成书的要求对内容进行修改和编辑,历时大半年,最终形成了目前

^① 由于我国把镇(town)和市(city)都称为城市,所以把原来与rural(乡村)相对的urban(城镇)一词的动词译为城市化。可见,城市化与城镇化在学术上是同一意思。不同的是,城镇化的提出及运用有其政策上的含义。

奉献给大家的这样一本专著。如果说,本书缘起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现在这本书的顺利面世,则更多地倾注了海内外众多关心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学者的智慧和“心血”。

二、本书的内容

本书除序言和附录外,共分6篇60章。

本书选择美国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提交给会议的书面论文作为序言。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自己的经历和对中国经济的分析,阐述了如何认识时代对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以及经济学家如何通过自己的出色工作迎接这一挑战。它在众多的城市化问题研究论文中具有高屋建瓴的作用,在《中国经济问题》上发表后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欢迎。这位一直十分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国经济学家的殷切之情,将鼓励更多的中国经济学者为祖国的发展拿出更出色的研究成果。因此,以这篇论文来作为“开场白”,是十分合适的。

正文6篇中前两篇是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总论。第1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宏观透视”,重点是评析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这一篇共有9章。

前三章是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总体评估。在第1章中,苏州大学夏永祥教授等分析了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的实践特点。他们指出,城市化进程具有阶段性规律,全过程呈一条倒S型曲线;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但城市规模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城市化进程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城市化水平不可能脱离经济水平畸高或畸低。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却呈现出不同的轨迹:①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具体表现为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不相协调,呈现出与世界城市化进程一般规律不同的反常的现象;②目前我国已达到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建国后有两个城市化加速阶段。从与工业化的关系来看,1949—1977年的增长阶段表现为缺乏城市化的工业化,1977年至现在的增长阶段又表现为缺乏工业化和人口规模支持的过度城镇化。这种不协调现象,是与20世纪50年代实行工业化赶超战略,以及为实施这种战略逐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计划经济体制和80年代后的渐进式市场取向改革分不开的。安徽社科院程必定教授在第2章中分析指出,根据工业化的内涵和外延对中国城市化水平进行评价,实际上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处于“双低”状态,即工业化水平偏低,不足以拉动城市化,通常认为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看法是一种错觉。厦门大学李文溥教授等在第3章中用不同方法对中国实际城市化水平进行了估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国际比较。他们指出,中国目前实际的城市化水平仅仅比国际正常水平略微偏低,不存在异常的偏低现象,但却存在严重的城市规模结构偏差。近20年来侧重发展小城市,小城市比重上升,使得服务业缺乏必要的市场空间,导致了城市效率下降,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展。

第4、5、6章是对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美国奥马哈内布拉斯加大学林双林博士等在第4章通过分析中国大中城市人均GDP增长与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劳动

力增长、政府开支和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后指出,已建公路和政府科技方面的开支等几个因素与人均 GDP 增长呈正相关,中国城市的人均 GDP 没有明显的收敛证据,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城市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趋同倾向。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张宏霖博士在第 5 章中运用时间序列和跨地区数据,研究了 1978 年至 1998 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他的结论是:①城市化的发展基本上是由经济增长引起的;②省际间存在大的差异,省内城市化水平主要是由本省经济发展决定的;③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对省一级城市化的影响不大,但是地理和历史因素在城市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陈爱民博士等在第 6 章中指出,影响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因素是城市产业结构。他们的计量分析表明,城市非农业人口的增长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比例呈负相关关系,即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要快于第三产业不发达的城市。外商实际投资、人均 GDP 也对城市化起重要作用。但城市的住房、交通条件、个体经济发展等对在所考察时段中的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不起决定性作用。

第 7、8、9 章着重讨论中国城市的生产率和规模分布。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潘佐红博士等在第 7 章试图检验中国城市生产力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他们发现中国城市普遍存在显著的集聚经济效应。但集聚优势主要来源于同一产业企业在地域上的集中所带来的地域集聚经济效益,而不是城市本身发展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城市化经济效益。中国城市还没有完全利用集聚经济效益,而一部分城市已超过了同一产业的地域集中最优规模。美国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宋顺锋博士等在第 8 章指出,最近 20 年里,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但对城市规模的计量显示,最近 10 年中中国整体城市规模分布变得更加分散。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政府推行了小城镇发展战略。在第 9 章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玫博士认为,中国工业和城市在改革后向相同的区域集聚。她的经济分析也表明,尽管乡村工业的发展对中国工业的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它却延缓了城镇化进程。为此,中国需要加快大中型城市的发展,以促进新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形成。

第 2 篇“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目标和战略”,重点在于展望中国城市化的未来。这一篇共由 10 章组成。

第 10、11、12 章着重从总体上探讨中国城市化的战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研究员等在第 10 章指出,中国城市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城市化水平低;②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低;③区域发展不平衡;④城市平均规模偏小。今后中国城市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在未来 20 年内将城市化水平提高到 60% 左右,并在扩大中小城市数量的同时,适当重视大城市数量扩大和功能提升。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杜鹰研究员在第 11 章中着重分析了今后中国城市化的进度。他认为,今后 10 年是我国加速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如 2010 年城镇化率达到 42%,则城镇人口将达到 5.77 亿人,比 1999 年增加 1.88 亿人,剔除自然增长部分,11 年要转移农村人口 1.44 亿人,年均 1 300 万人,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 1 个百分点。如按第五次人口普查口径计算,10 年间城镇人口增加 1.19 亿人,其中农村转移人口 9 100 万人,平均每年转移 910 万,城镇化率年均需提高 0.6 个百分点,与此前 20 年的速度大体相当。他认为,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施城镇化发展的新方针。《“十五”计划纲要》提出的“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的新表述,较之过去的

提法相比,有对发展大中城市态度更加积极和强调因地制宜这两个鲜明的特点。在第12章中,厦门大学吴宣恭教授认为,加速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选择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地理、历史等复杂因素,因此,中国的城市发展道路应该多元化,选择由易到难、从低到高的步骤,先以建设具有一定集聚功能的小城镇为起点,解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沉淀在农村,收入难以提高,制约国内市场规模的突出问题。然后逐步改善小城镇和小城市的内部产业结构,促进它们向更高水平发展。同时要重视发展大中城市,发挥它们更大的聚集和辐射效应,使之成为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基地。

第13、14、15、16章着重从农村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和对策。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朱铁臻教授在第13章中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在第14章中,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指出,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城市发展水平低是因为政府采取了“城乡隔离政策”造成的,殊不知“城乡隔离政策”本身是一个果,而不是因。城市发展水平低和实行城乡隔离政策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后果。因此,要提高我国城市发展水平,必须从根本原因着手,放弃在资本密集产业上的赶超。要根据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才能扩大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业人口比重下降,推进城市化。浙江大学吴宇哲教授等在第15章中指出,中国城市发展如从“生态脚印”来衡量,总体上表现为“数量不落后,质量相当滞后”,突出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资源粗放利用和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因此,提高城市化质量和土地利用效率是今后我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在第16章中,厦门大学陈其林教授等认为,小城镇战略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城市发展的特殊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的性质与形态已发生重大变化的现阶段已不是我国城市化的最佳选择。今后应大力发展或扩展中小城市,使之成为吸纳农业人口的主要基地。

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化也遇到了新的环境和条件,如全球化、信息化、大都市化等等。因此,展望未来也要与时俱进。第17、18、19章的内容就反映了这一时代特点。在第17章中,日本国际开发中心主任研究员周牧之指出,中国城市化需要选择大城市圈发展战略。如何形成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城市圈,是中国赢得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激烈的国际竞争,获得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国防科技大学的朱启超在第18章中指出,中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要加速城市信息化。在宏观政策调控下,发挥信息化城市网中各节点城市的信息交互和辐射作用,才能避免区域经济的亚封闭发展,满足大城市经济能量正向集聚和小城镇发展逆向融合的发展需求。在第19章中,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杨家文博士等分析了城市化与全球化、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他们认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特别着重解决好城市化和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城市化与国内经济一体化具有内在的关联,可以相互促进。发展壮大本国企业并提高它们对国内市场的覆盖率,是实现城市化、国内经济一体化并达到主动有利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关键。

后四篇着重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属于分论。第3篇为“城市化与

农村工业化、农业劳动力移转”。这一篇共由 11 章组成。

第 20、21、22 章重点讨论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体方式及其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关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前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盖尔·约翰逊教授在第 20 章中指出,中国要通过创造大量非农产业工作岗位来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调整从而推进城镇化。在未来 30 年里,中国大约每年需要提供 1 500 万个新的非农产业工作岗位,来满足从农业领域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但是,这些工作岗位主要由现有大城市来提供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指望现有乡村提供非农产业工作岗位的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也是不可能的。一个可考虑的选择是在众多小城市和与现在众多的农村劳动力居住的乡村交往距离较近的市镇中,也就是在“通勤”的范围中,创造大部分的非农产业岗位。这将大大减少由于劳动力实际转移到大中城市去的巨大的资本投资。在第 21 章中,浙江大学黄祖辉教授根据浙江的实践分析指出,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的根本原因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和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制度性障碍有关。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建立城乡人口流动利益补偿与要素集聚机制。美国三一学院文贯中博士在第 22 章中着重分析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促进城市化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为了社区内部小范围的公平却排斥了社区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加剧了农村就业问题,减缓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与典型的市场经济要求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土地制度在减缓、扭曲城市化进程方面的影响作进一步的探讨和改革。

第 23、24 章着重讨论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在第 23 章中,香港大学赵蓓博士以福建晋江市为例,在考察了集群产业发展对农村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后指出,集群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所在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又促进了本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据此她提出,要以扶植集群产业为切入点来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梁在博士等在第 24 章中重点考察了农村工业化对农村人口迁移的影响。他们指出,农村工业化对减少农村人口的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都没有系统的影响,乡镇企业并不能减少农村人口的迁移,因此利用乡镇企业发展来减少农村人口迁移的政策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第 25、26、27、28、29 和 30 章,具体讨论了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各种具体形式和影响因素。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张宏霖博士等在第 25 章中重点分析了 20 年来中国城乡移民与城市化的关系。他们运用时间序列和跨地区数据,定量分析城乡移民的决定因素。结论是:①城乡移民是城市人口增加的主要源泉;②城乡移民与中国经济增长同步,移民现象是由经济增长引起的,而不是相反;③城乡收入差距助长了跨省移民,但空间距离又削弱了这种移民倾向;④省内移民数量与本省的城市化水平呈反比。在第 26 章中,北京大学姚洋博士研究了发达地区四个村本地人和移民的劳动力市场。他指出,从工种和工资两个方面考察,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外地人得到管理工作的机会显著低于本地人的机会,但一个人是否是外地人对其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决定本地人工资的显著因素是非人力资本因素,而决定外地人工资的显著因素恰恰是人力资本因素。与此相联系,他的同事,北京大学赵耀辉博士在第 27 章中,运用农村家庭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尤其是移民关系网的作用。她指出,仅仅意识到城乡收入存在差距还不足以使

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他们还必须得到已经在外打工人员的帮助。移民关系网减少了流动成本,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在第 28 章中,大连民族学院董藩教授等运用生命历程理论,从人文关怀的特定角度,研究三峡库区的移民问题。他们认为,要从移民事件的历史效应、移民事件对库区移民生命历程的影响和移民的融入性等方面考虑和制定移民政策。美国人口调查局专家丹尼尔·古德肯特等在第 29 章中从专业的角度,重点对主要由农村剩余劳动力构成的中国流动人口进行了讨论。他们分析了流动人口的定义和构成,估算出中国现有流动人口 1 亿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 8%,还对影响流动人口未来趋势的一些因素作了评述。由英国密得塞克斯大学姚树洁博士等撰写的第 30 章,虽然讨论的是收入不平等对反贫困的影响问题,但由于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脱贫离不开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因而仍从一个重要方面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他们估算出一个可比较的农村贫困线,并据此分析指出,中国的贫困发生率远比官方估算的要多,而且减少贫困的缓慢进程不能归因于收长增长不足,而是正在上升的收入不平等。据此他们认为,今后要从降低收入不平等,鼓励、允许劳动与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两个方面来制定反贫困政策。

第 4 篇“城市化发展中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把研究的视角从上一篇的农村转到城市,讨论城市发展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政府的政策作用。这一篇共有 11 章。

第 31、32、33 章讨论政府在城市化中的作用。他们共同的观点是,政府政策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变量。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冯毅博士等从一个大的框架来讨论人口变迁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政府作用。他们在第 31 章中引入了一个人口变迁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政治经济模型,论证了政治稳定性和政府能力对出生率,进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他们据此认为,中国政府应继续实行降低人口增长速度的政策,以减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成本,节约为创造非农就业机会服务的地方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第 32 章中,厦门大学陈甬军教授等运用福建的例子分析指出,中国的城市化除了自然、经济和人文社会因素推动之外,还有政府推动的因素。过去几十年,政府影响城市化的两个主要作用领域表现在人口户籍制度和投资政策上。今后,逐步消除城市化的体制壁垒,解除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流动限制,重置城市投资模式,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城市的“公共产品”服务,应是政府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着眼点。第 33 章与上一章异曲同工,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等运用温州的城市化实例分析指出,转轨时期政府的行为往往对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具有相当的阻碍作用。这也是解释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下,大中城市比例偏低,而同时建制镇多而小现象的原因之一。

第 34、35、36、37 章讨论市场机制作用下城市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发展问题。美国托列多大学张欣博士在第 34 章中讨论了城市化与就业的关系。他指出:把当前中国城市存在的严峻的就业问题归咎于改革后农民大量进城是错误的。农民进城必然会增加城市熟练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从而从总体上增加城市的就业机会。从整体上说,推动城市化、鼓励农民进城,是解决中国就业的有效战略,也是根治不发达国家失业的根本手段。英国诺丁汉大学塞蒙教授和宋丽娜博士等在第 35 章中分析指出,中国传统的城市居民和民工工资水平上的歧视性差别已经大幅度消失,但大部分下岗职工仍处于失业状态,已再就业的工资收入也很低。从短期来看,下岗职业仍然受不完全有限选择余地等因素的影响。在第 36 章,香港中文大学张俊森博士等对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城镇双层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实证